

# 政策执行偏差情境下公众不公正感 对集群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

周云<sup>1</sup> 刘建平<sup>\*\*2</sup> 王鑫强<sup>2</sup> 许秀芬<sup>1</sup>

(<sup>1</sup> 遵义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 遵义, 563006)

(<sup>2</sup> 江西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南昌, 330026)

**摘要** 为探讨政策执行偏差情境下公众不公正感对公众集群行为的影响机制。采用问卷法对 1756 名社会公众进行调查, 结果显示: (1) 当局可责备性和愤怒情绪中介了公众不公正感对公众集群行为的影响。(2) 公众不公正感还通过当局可责备性→愤怒情绪的中介链作用于公众的集群行为。

**关键词** 政策执行偏差 不公正感 当局可责备性 愤怒情绪 集群行为

## 1 引言

有关集群行为的研究一直是社会心理学的一个研究热点, 围绕集群行为的诱发因素以及集群行为的心理动力机制等方面研究者取得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张书维, 2013; van Zomeren, Postmes, & Spears, 2008)。在集群行为的诱发因素中, 不公正感被认为是引发集群行为的一个核心诱发因素。研究表明, 不公正感对人们的破坏性竞争行为、集群行为参与(意向)、抗议行为以及政治上的激进行为等均有显著的预测作用(Osborne & Sibley, 2013)。

不公正感作为一种具有动机性质的主观感知与判断影响着人们的态度和行为。研究者关注公正感或不公正感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研究者们认为公正感或不公正感能影响人们的态度、行为等效果变量(龙立荣, 刘亚, 2004)。在政策执行偏差情境下, 公众的不公正感会影响公众的集群行为参与。当然, 由于实际集群行为难以测量, 研究者大多通过对集群行为意向的测量来替代实际的集群行为。研究表

明, 在难以获得实际行为时, 行为意向是与行为最接近的变量(张书维, 周洁, 王二平, 2009)。

政策执行偏差情境下公众不公正感如何影响公众的集群行为呢? 当局的可责备性可能是一个重要的中介变量。在现实情境中, 当公众体验到不公正尤其是程序不公正时, 公众往往会将不好的结果归咎于政府当局, 从而产生指向政府当局的怨恨情绪及对抗行为。研究表明, 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偏差情境下当局可责备性是公众对地方当局情绪、行为反应的心理基础(周云, 刘建平, 王鑫强, 许秀芬, 2018)。并且, 根据归因及责任判断模型的观点, 人们对消极事件的认知评价决定了人们对责任主体的行为反应及反应强度等(Rudolph, Roesch, Greitemeyer, & Weiner, 2004)。政策执行偏差情境中, 公众由于利益受到侵害从而产生不公正感, 如果公众认为地方当局应当为公众利益受损承担责任, 公众很有可能会通过集群行为的方式维护自身的正当利益。据此, 提出研究假设 1: 政策执行偏差情境下公众不公正感知通过当局可责备性的中介对集群

\*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4BSH071)、遵义师范学院博士基金项目(尊师 BS2019-15 号)和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XL19106)的资助。

\*\* 通讯作者: 刘建平。E-mail: liujianping@jxnu.edu.cn

DOI: 10.16719/j.cnki.1671-6981.20200520

行为产生影响。

除了当局可责备性外,愤怒情绪也有可能中介政策执行偏差情境下公众不公正感与集群行为之间的关系。当人们感到不公正时往往具有十分强烈的愤怒、敌意等情绪体验,这些消极的情绪极易诱发人们参与集群行为。而集群行为的研究历来重视情绪尤其是外在指向的愤怒情绪的作用,研究表明群体愤怒对于集群行为的作用尤为显著(张书维,王二平,周洁,2012)。集群行为双路径模型(van Zomeren, Spears, Fischer, & Leach, 2004)认为人们通过社会比较在主观上产生不公正感,不公正感通过愤怒情绪的作用使人们参与集群行为。实证研究也表明,愤怒情绪中介了不公正感与集群行为参与之间的关系(Lodewijckx, Kersten, & van Zomeren, 2008)。据此提出研究假设2:愤怒情绪中介了政策执行偏差情境下公众不公正感与集群行为之间的关系。

政策执行偏差情境下公众不公正感还有可能通过当局可责备性和愤怒情绪所组成的中介链影响集群行为。Brockner(2002)认为不公正感对情绪的影响关键取决于结果变量是对自我的评价(如自尊)还是对他人或实体的评价(例如组织)。当他人或实体对不公正有责任时,人们会做出外在责备判断(责备他人或实体),并产生较高的愤怒情绪体验。实证研究也表明不公正感与可责备性之间相关显著(Mikula, 2003);可责备性能正向预测愤怒情绪(Rudolph et al., 2004);愤怒情绪能显著正向预测集群行为(张书维等,2012)。政策执行偏差情境下公众如果认为不公正现象是由地方政府当局造成(即当局具有可责备性),就会产生指向地方政府的愤怒情绪,从而在愤怒情绪的驱使下参与集群行为。这样,当局可责备性和愤怒情绪就会形成一个中介链,不公正感通过这个中介链影响公众的集群行为。据此,提出研究假设3:公众不公正感可以通过当局可责备性和愤怒情绪所组成的中介链作用于公众的集群行为。

综上所述,政策执行偏差情境下公众不公正感对公众集群行为的影响可能存在三条中介路径。具体如图1所示:公众的不公正感可能通过当局可责备性的中介作用于公众的集群行为;也可能通过愤怒情绪的中介作用于公众的集群行为;还可能通过当局可责备性→愤怒情绪这一中介链作用于公众的集群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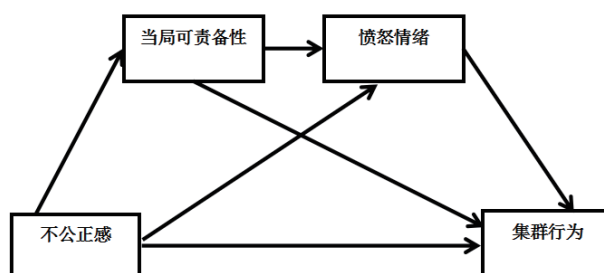


图1 研究模型假设示意图

## 2 研究方法

### 2.1 被试

参考前人研究中的抽样方法(Zhang, Wang, & Chen, 2011),从贵州、江西、山东三个省选取被试。其中,贵州省抽取30个县(市),江西省、山东省各抽取15个县(市)。每个县(市)调查32户居民,共发放问卷1920份,实际回收问卷1756份,涵盖十大职业分类、各年龄阶段、各社会阶层。将问卷第一题“您最近两年是否遭遇过本地政府部门(本地政府部门指县或区及以下政府部门,下同)使您无法获得您本应获得的福利、资源和便利从而损害您切身利益的情况?”做“否”回答的问卷剔除,剩余有效问卷1327份。其中男性730人,女性597人;城市390人,区县261人,乡镇311人,农村365人;20-30岁149人,31-40岁460人,41-50岁562人,50岁以上156人。

### 2.2 问卷测量项目

政策执行偏差。

政策执行偏差通过以下题目进行测量“您最近两年是否遭遇过本地政府部门(本地政府部门指县或区及以下政府部门,下同)使您无法获得您本应获得的福利、资源和便利从而损害您切身利益的情况?”被试做出是“是”或“否”的选择。如果被试选择为“是”,要求被试详细写出具体的情况。

不公正感。

不公正感由3个项目组成,参考张婧(2010)研究中关于不公正感的题干和题项,从分配不公正感、程序不公正感、互动不公正感三个维度进行测量。包括“本地政府部门是否使您公平的享受政策规定的各种社会福利和资源?”等。被试在“非常公平”到“非常不公平”的5点量表上做出选择。三个子项目的Cronbach's  $\alpha = .882$ 。

当局可责备性。

当局可责备性由3个项目组成,参考Barclay,

Skarlicki 和 Pugh (2005) 研究中关于组织可责备性的题干和题项, 包括“本地政府部门应当为您没有公平享受到政策规定的各种福利和资源承担多大的责任?”等。被试在“非常小”到“非常大”的 5 点量表上做出选择。三个子项目的 Cronbach's  $\alpha = .879$ 。

愤怒情绪。

愤怒情绪由 3 个项目组成, 参考张书维 (2013) 研究中关于群体愤怒的题干和题项, 包括“您对本地区政府部门的愤怒程度有多高?”等。被试在“非常低”到“非常高”的 5 点量表上做出选择。三个子项目的 Cronbach's  $\alpha = .908$ 。

集群行为意向。

集群行为意向由 3 个项目组成, 参考张书维 (2013) 研究中集群行为意向的题干和题项, 包括“如有人带头, 您参与针对本地政府部门的集体静坐行动的可能性有多大?”等。被试在“非常不可能”到“非常可能”的 5 点量表上做出选择。三个子项目的 Cronbach's  $\alpha = .880$ 。

### 2.3 施测过程

问卷调查员进行入户调查, 每户为一个单位, 被试在调查员的指导下独立完成问卷。问卷填写完毕后, 被试获得十元的微信红包或等价的小礼品作为参与本研究的酬谢。

### 2.4 数据处理

采用 SPSS 21.0 和 Mplus 7.0 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处理。

## 3 结果

### 3.1 共同方法偏差控制与检验

本研究中通过被试自陈法收集数据, 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在问卷具体施测的过程中采取严格的程序控制, 并对可能存在的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采用验证性因素分析方法对“单一因素解释了所有变异”这一假设进行检验 (周浩, 龙立荣, 2004)。结果如下:  $\chi^2/df = 71.73$ , CFI=.66, NNFI=.58, RMSEA=.231, SRMR=.123; 各项指标均不支持假设, 说明本研究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在允许的范围内。

### 3.2 各项目描述统计结果及相关

各项目描述统计结果及相关如表 1 所示, 从表中可知政策执行偏差情境下公众的不公正感、当局可责备性、愤怒情绪、集群行为两两之间均相关显著。

### 3.3 中介效应检验

本研究根据温忠麟和叶宝娟 (2014) 推荐的中介效应检验流程进行分析, 采取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当局可责备性、愤怒情绪在公众不公正感和公众集群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首先检验公众不公正感对公众集群行为的影响, 结果如下:  $\chi^2/df = 2.39$ , CFI=.99, NNFI=.99, RMSEA=.019, SRMR=.013。如图 2 所示, 在控制了性别、年龄等人口统计学变量后, 公众的不公正感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公众的集群行为 ( $\gamma = .47$ ,  $t = 16.68$ ,  $p < .001$ )。

接下来进行链式中介分析, 链式中介分析结果表明 (具体见图 3 和表 2), 在控制了性别、年龄等人口统计学变量后样本数据对模型拟合良好:  $\chi^2/df = 6.08$ , CFI=.99, NNFI=.99, RMSEA=.049, SRMR=.03。公众不公正感能够正向预测当局可责

表 1 各项目描述统计结果及相关

项目	平均数	标准差	1	2	3	4
1.不公正感	3.60	.62	-			
2.当局可责备性	3.60	.78	.39***	-		
3.愤怒情绪	3.54	.75	.72***	.41***	-	
4.集群行为	3.28	.99	.48***	.37***	.55***	-

注: \*\*\*  $p < .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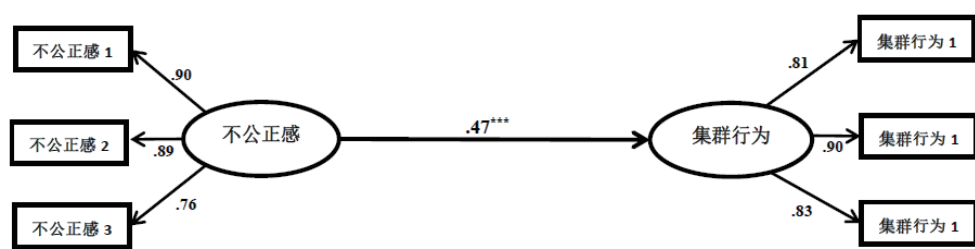


图 2 公众不公正感对公众集群行为的影响

备性 ( $\gamma=.39, t=13.91, p<.001$ )；当局可责备性能够正向预测公众集群行为 ( $\gamma=.14, t=4.09, p<.001$ )。采用 Bootstrap 法抽样 1000 次计算当局可责备性在公众不公正感与公众集群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 95% 的区间为 [.041, .081]。因此, 当局可责备性中介了公众不公正感与公众集群行为之间的关系。中介效应量为 .126, 假设 1 得到验证。

对愤怒情绪的中介效应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公众不公正感能够正向预测公众愤怒情绪 ( $\gamma=.66, t=29.69, p<.001$ )；愤怒情绪能够正向预测公众集群行为 ( $\gamma=.39, t=11.22, p<.001$ )。采用 Bootstrap 法抽样 1000 次计算愤怒情绪在公众不公正感与公众集群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 95% 的区间为 [.210, .307]。因此, 公众愤怒情绪中介了公众不公正感与集群行为之间的关系。中介效应量为 .536,

假设 2 得到验证。对中介链的中介效应的分析表明公众不公正感能够正向预测当局可责备性 ( $\gamma=.39, t=13.91, p<.001$ )；当局可责备性能够正向预测公众愤怒情绪 ( $\gamma=.15, t=6.39, p<.001$ )；愤怒情绪能够正向预测公众集群行为 ( $\gamma=.39, t=11.22, p<.001$ )。采用 Bootstrap 法抽样 1000 次计算当局可责备性和愤怒情绪所组成的中介链的中介效应, 95% 的区间为 [.014, .032]。因此, 公众的不公正感通过当局可责备性→愤怒情绪这一中介链对公众集群行为产生影响。中介效应量为 .049, 假设 3 得到验证。

## 4 讨论

### 4.1 当局可责备性在不公正感与集群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表明, 政策执行偏差情境下当局可责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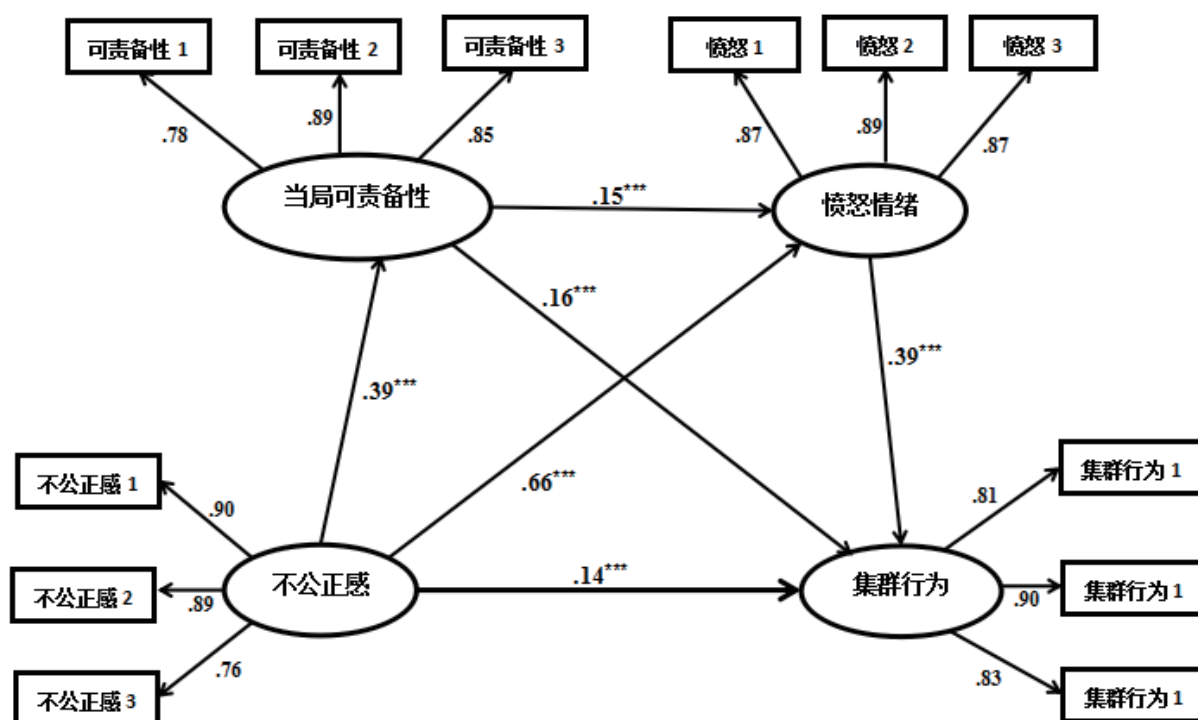


图3 链式中介效应模型

表2 中介效应 Bootstrap 检验和效应量

路径	效应值	区间 (95%)	效应量
直接路径			
不公正感→集群行为	.137		
中介路径			
不公正感→当局可责备性→集群行为	.060	[.041, .081]	.126
不公正感→愤怒→集群行为	.254	[.210, .307]	.536
不公正感→当局可责备性→愤怒→集群行为	.023	[.014, .032]	.049
总中介效应	.337		.711
总效应	.474		



性中介了公众不公正感知与公众集群行为之间的关系。不公正尤其是程序不公正和互动不公正含有可责备信息,当人们遇到消极的结果时,程序和互动公正与否就成了决定他人或实体责任的关键(Cropanzano & Ambrose, 2001)。如果程序不公正或互动不公正,人们会认为他人或实体就具有可责备性。而他人或实体的可责备性又能正向影响人们的攻击或报复等消极行为(Rudolph et al., 2004),他人可责备性就成了不公正感与消极行为的中介变量。在政策执行偏差情境下,由于消极的结果往往与程序上的不公正和互动上的不公正紧密联系,使得公众产生较高的政府当局可责备性,并最终影响公众的集群行为参与,即当局可责备性中介了不公正感对公众集群行为的影响。

#### 4.2 愤怒情绪在不公正感与集群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

虽然有关公正的理论都会涉及到情绪,但是对情绪所起的作用很大程度上被研究者所忽视;情绪不但可以作为结果变量,还可以作为一种中间机制将不公正(或公正)和行为联系起来(Weiss, Suckow, & Cropanzano, 1999)。当人们体验到愤怒情绪,愤怒情绪能驱使人们纠正侵害行为并阻止未来可能的不公正。本研究发现政策执行偏差情境下,公众越是感知到不公正,公众会产生强烈的愤怒情绪,并在愤怒情绪的作用下产生集群行为。本研究结果符合集群行为的情绪聚焦路径,即愤怒情绪在不公正感与集群行为参与之间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这也说明在不公正感知对集群行为的影响中存在认知→情绪→行为这一加工路径。

#### 4.3 当局可责备性和愤怒情绪的链式中介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当局可责备性和愤怒情绪组成的中介链中介了公众不公正感与集群行为之间的关系。公众越是感知到不公正,公众会产生更强烈的当局可责备性,在当局可责备性的作用下产生愤怒情绪,并进一步引发集群行为。根据现代公平理论的观点(Folger & Cropanzano, 2001),不公正的程序或不公正的人际对待等不仅仅使得人们进行外在责备也会激发人们的参照认知,人们通过参照认知进行或然、可然、应然的反事实思维。不公正感知会使得个体进行外在责备,当个体认为他人或实体应该为侵犯受到责备时,个体会体验到愤怒等外在指向的消极情绪,并在外愤怒情绪的作用下产生消极行为反应。在政策执行偏差情境下,公众一般都认为不公正是由地方政府当局造成,地方政府当局应当为不公正

承担责任、受到责备,这种对政府当局的责备使得人们产生愤怒情绪,并在愤怒情绪的作用下产生集群行为,即不公正感知→当局可责备性→愤怒情绪→集群行为。

#### 4.4 研究的启示

本研究结果对于各级地方政府当局应对政策执行偏差损害公众利益所导致的集群行为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首先,政策执行偏差情境下各级政府当局的重中之重应当是安抚公众的情绪,缓解公众在政策执行偏差情境下的愤怒情绪能减少公众参与集群行为的动力,从而实现降低公众参与集群行为尤其是具有破坏性的非规范集群行为的可能性。其次,各级政府当局在政策推行的过程中要注意程序的公平正义和工作方法的科学合理性,并在工作中做到与公众进行耐心、细致的沟通交流。通过降低政府当局可责备性实现减少公众的愤怒情绪和参与集群行为的可能性。

#### 4.5 研究的不足之处

首先,本研究没有探讨不公正感的不同维度对情绪和集群行为意向等结果变量可能存在的不同影响,今后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探讨政策执行偏差情境下程序不公正或互动不公正能否调节结果不公正对情绪和集群行为意向等结果变量的影响。

其次,本研究并没有测量公众真正的集群行为参与而是对公众的集群行为意向进行测量,需要研究者在下一步研究中探究政策执行偏差情境下不公正感对公众实际参与集群行为的影响机制。

### 5 结论

(1) 政策执行偏差情境下,当局可责备性中介和愤怒情绪中介了公众不公正感与公众集群行为之间的关系。

(2) 政策执行偏差情境下,公众的不公正感还可以通过当局可责备性→愤怒情绪这一中介链作用于公众的集群行为。

#### 参考文献

- 龙立荣,刘亚.(2004).组织不公正及其效果研究述评.心理科学进展,12(4),584-593.
- 温忠麟,叶宝娟.(2014).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和模型发展.心理科学进展,22(5),731-745.
- 张婧.(2010).当局信任对公众态度和合作行为的影响:分配公正感和程序公正感的中介作用.中国科学院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张书维.(2013).群际威胁与集群行为意向:群体性事件的双路径模型.心理学报,45(2),1410-1430.

- 张书维, 王二平, 周洁. (2012). 跨情境下集群行为的动因机制. *心理学报*, 44(4), 524-545.
- 张书维, 周洁, 王二平. (2009). 群体相对剥夺前因及对集群行为的影响——基于汶川地震灾区民众调查的实证研究. *公共管理学报*, 6(4), 69-77.
- 周浩, 龙立荣. (2004). 共同方法偏差的统计检验与控制方法. *心理科学进展*, 12(6), 942-950.
- 周云, 刘建平, 王鑫强, 许秀芬. (2018). 政策执行偏差严重程度对公众地方政府责任判断的影响机制. *心理科学*, 41(4), 910-915.
- Barclay, L. J., Skarlicki, D. P., & Pugh, S. D. (2005). Exploring the role of emotions in injustice perceptions and retaliation.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0(4), 629-643.
- Brockner, J. (2002). Making sense of procedural fairness: How high procedural fairness can reduce or heighten the influence of outcome favorability.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7(1), 58-76.
- Cropanzano, R., & Ambrose, M. L. (2001). Procedural and distributive justice are more similar than you think: A monistic perspective and a research agenda. In J. Greenberg & R. Cropanzano (Eds.), *Advances in organizational justice* (pp. 119-151).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Folger, R., & Cropanzano, R. (2001). Fairness theory: Justice as accountability. In J. Greenberg & R. Cropanzano (Eds.), *Advances in organizational justice* (pp. 1-5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Lodewijckx, H. F. M., Kersten, G. L. E., & van Zomeren, M. (2008). Dual pathways to engage in 'silent marches' against violence: Moral outrage, moral cleansing and modes of identification. *Journal of Community and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18(3), 153-167.
- Mikula, G. (2003). Testing an attribution-of-blame model of judgments of injustic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3(6), 793-811.
- Osborne, D., & Sibley, C. G. (2013). Through rose-colored glasses: System-justifying beliefs dampen the effects of relative deprivation on well-being and political mobilizatio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9(8), 991-1004.
- Rudolph, U., Roesch, S., Greitemeyer, T., & Weiner, B. (2004). A meta-analytic review of help giving and aggression from an attributional perspective: Contributions to a general theory of motivation. *Cognition and Emotion*, 18(6), 815-848.
- van Zomeren, M., Postmes, T., & Spears, R. (2008). Toward an integrative social identity model of collective action: A quantitative research synthesis of three socio-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4(4), 504-535.
- van Zomeren, M., Spears, R., Fischer, A. H., & Leach, C. W. (2004). Put your money where your mouth is! Explaining collective action tendencies through group-based anger and group efficac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7(5), 649-664.
- Weiss, H. M., Suckow, K., & Cropanzano, R. (1999). Effects of justice conditions on discrete emotion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84(5), 786-794.
- Zhang, S. W., Wang, E. P., & Chen, Y. W. (2011). Relative deprivation based on occupation: An effective predictor of Chinese life satisfaction.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4(2), 148-158.

#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for Public Injustice on Collective Behavior under the Context of Policy Execution

Zhou Yun<sup>1</sup>, Liu Jianping<sup>2</sup>, Wang Xinqiang<sup>2</sup>, Xu Xiufen<sup>1</sup>

(<sup>1</sup> School of Education, Zunyi Normal College, Zunyi, 563002)

(<sup>2</sup> School of Psychology,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26)

**Abstract** In current society, public collective behaviors triggered by local government policy executing deviations or improper administrative damages to the public interest have occurred from time to time, which has brought great harm to social stability and government reputation. In order to further explore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for public injustice on collective behavior under the context of policy executing deviations, a typical sampling method was used to select 1756 publics from 60 counties (cities) in Guizhou, Jiangxi, and Shandong provinces for questionnaire survey.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1) In the context of policy executing deviations, the public injustice significantly predicts the public collective behavior. Moreover, the authority blameworthiness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ublic injustice perception and public collective behavior. Since negative outcomes are often closely connected to procedural injustices and unfair interactions, the public has a higher governmental authority blameworthiness which ultimately affects the public collective behavior. (2) In the context of policy executing deviations, the public angry feeling mediates the impact of public injustice on public collective behavior. The angry feeling is closely connected to the direct confrontation on aggressors, punishment behavior, reprisal and so on. The more the public perceives injustice, the stronger anger the public will have which evokes collective behavior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ngry feeling. This also shows that in the impact of unfair perception on collective behavior, there is also a same processing path: cognition → emotion → behavior. (3) In the context of policy executing deviations, the intermediary chain consisted of authority blameworthiness and angry feeling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ublic injustice and collective behavior. The more the public perceives injustice, the stronger authority blameworthiness the public will have. This evokes angry feeling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uthority blameworthiness, and further triggers collective behavior. Unfair perception will make the individual blame externally. When the individual thinks that the other person or entity should be blamed for the violation, the individual will experience the external negative emotions such as anger and evoke negative behavioral response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external angry feeling.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have certain implications for local government authorities at all levels to respond to mass disturbances caused by the public interest under the damage of policy executing deviations. Firstly, local government authorities at all level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appease and eliminate the public angry feeling when dealing with mass disturbances caused by policy executing deviations, and alleviate public anger in the context of policy executing deviations, which can decrease the motivation of the public to participate in collective behavior, so as to achieve the possibility of decreasing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collective behavior, especially destructive non-canonical collective behavior. Secondly, local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should also pay attention to decreasing the authority blameworthiness in the context of policy executing deviations, especially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fairness and justice of procedures and the scientific rationality of working methods, and to be patient and meticulous in the communication during work, which could decrease the public anger and the possibility of participating in collective behavior by decreasing the authority blameworthiness of the government.

**Key words** policy executing deviation, injustice, authority blameworthiness, angry, collective behavior